



〔俄罗斯〕

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 编撰

世界文学史

第七卷·下册

上海文艺出版社

014061244

I109

111

V7-2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俄罗斯〕

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 编撰

世界文学史

第七卷·下册



I109

111

V7-2

上海文艺出版社



北航

C174835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文学史. 第7卷/俄罗斯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编撰; 蔡捷等译.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3.12(2014.7 重印)

ISBN 978-7-5321-5103-5

I. ①世… II. ①俄…②蔡… III. ①世界文学-文学史
IV. ①I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98630 号

责任编辑: 徐华龙

封面设计: 王志伟

世界文学史·第七卷

(俄罗斯) 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 编撰
蔡捷等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71.5 插页 8 字数 1,283,000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103-5/I·4020 定价: 235.00 元(上下二册)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7780459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СССР
ИНСТИТУТ МИРОВ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ИМ. А. М. ГОРЬКОГО

ИСТОРИЯ ВСЕМИР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ТОМ СЕДЬМОЙ

РЕДАКЦИОННАЯ КОЛЛЕГИЯ ТОМА
И. А. БЕРНШТЕЙН (ответственный редактор),
У. А. ГУРАЛЬНИК, А. Б. КУДЕЛИН, Н. С. НАДЪЯРНЫХ,
З. Г. ОСМАНОВА, Н. С. ПАВЛОВА,
З. М. ПОТАПОВА, Н. Б. ЯКОВЛЕ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91

第三编 中欧及东南欧文学

• 467

本编序言

中欧及东南部欧洲各国文学的进程十分相似,这是由于它们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历史命运十分接近。这样的共同性也体现在十九世纪下半叶。

当时,所有这些国家都面临着民族解放的问题。这一问题在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希腊等国最终都得以解决。隶属于哈布斯堡王朝的众斯拉夫民族(捷克、斯洛伐克、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于这个时期在民族文化发展领域获得了众所周知的成就。1867年,在奥地利和匈牙利两国统治阶级间协约的基础上建立了奥匈二元君主制国家。但是这些事件并不是发生在该段历史时期(被考察的时期)内,而对于民族独立问题的态度则成为了十九世纪下半叶整个精神生活的一大特征。波兰的情况较为特殊,它的土地曾被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和普鲁士瓜分。

该地区几乎每个国家在这个历史时期中都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日期。在某些情况下,这一日期甚至是新的历史时期的开端(如,1878年保加利亚解放,同一年独立的罗马尼亚建立,1867年奥匈二元君主制国家建立,1863年波兰起义)。在半个世纪中,有一些十分重要的历史因素发挥着作用。这些因素使得这一发展阶段显得尤为特别。这些因素是在民族解放斗争问题的影响下形成的,这一问题甚至在取得了国家和政治独立之后也没有很快地消失。十分相似的还有其他一些社会历史特征,首先包括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这一发展进程在大多数国家因受到强大的封建主义残余的阻碍而停滞——和与之相关的尖锐的农民问题。

该地区的所有国家都经历了一个审美意识加速,或者说紧凑发展的阶段,因为之前的各历史时期所具有的民族压迫环境不适合它(审美意识)的发展。然而,当我们在谈论类似过程的时候,我们并不是指加速经历西欧文学之前所经历过的那些阶段。该地区的文学中现实主义——它的形成乃

是该历史时期文学生活的一大基本特征——并不与浪漫主义相矛盾,而更多的是在其发展过程中改造了后者。以前众多流派,如启蒙主义、感伤主义等,未完全形成的、被压制的一些趋向有时也被吸收进来。

与此同时,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形成过程既不同步,也不相同。确定该地区各国文学间共同的类型化特征并不抹煞其各自的,有时也是十分显著的民族特征。处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各国与被哈布斯堡王朝占领的各国在传统和文化情境上有很大不同。该历史时期内文学发展模式最接近西欧的是波兰。然而,如果说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它对于浪漫主义发展所作的独特贡献十分重大的话,那么在六十至八十年代将现实主义确定为主导流派则有些滞后——即在西欧实证主义繁荣,自然主义趋向形成的时期,且这两者对于这一过程产生了影响。八十年代现实主义渐趋成熟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俄罗斯文学的影响下完成的。

位于历史发展的另一极上的是阿尔巴尼亚文学。在封建主义时期,阿尔巴尼亚遭受了奥斯曼帝国最为残酷的压迫。只有到七十至八十年代才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此时的文学还带有启蒙主义特征。卢日昌塞维亚人民民族意识的形成过程也快速进行着。

468 ·

该地区大多数国家的文学都呈现出各种流派互相交错、浪漫主义传统持续发展的特征,在该时期末期,批判现实主义流派渐渐占了主导地位。

在地区内部还持续保有众所周知的斯拉夫众文学间的亲近性。斯拉夫民族间在种族和语言上的亲缘关系催生出更高层次的文化联系。但是相比于前一个时期来说,在这一时期斯拉夫民族之间相关性的观点并不鲜明,虽然这些观点并未完全失去自身的吸引力而通过变体得以呈现。精神价值的交流变得更加强烈。浪漫主义在各国文学中的快速发展使得拜伦、海涅、雨果、裴多菲、密茨凯维奇、莱瑙等人的名字变得十分风靡。对于现实主义形成过程中的这一阶段来说,西欧的文学巨匠中最为重要的或许要数狄更斯了,他的知名度尤为重大。但是对于大多数国家,特别是斯拉夫国家的现实主义的形成为最重要的是俄罗斯文学和革命民主主义批评。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中最为流行的是果戈理和屠格涅夫,而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该地区大部分国家中的流行度和影响力则要来得晚些。

对于奥匈帝国和普鲁士帝国中各民族文学间的联系和相互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毫无疑问的是,在备受艺术上被德意志化损害的同时,在某些情况下和德国文化的亲近性也带来了正面的影响。

自然而然的是,这一时期的所有文学是在民族文化总体快速发展的环境下完成历史运动的。但是比喻修辞的形式和各种艺术种类的发展水平并不是同步的。比如,波兰在前一个时期达到了类似的同步(浪漫主义诗

歌——肖邦的音乐)，而相反的是，实证主义思想的传播在造型艺术和音乐方面却成果寥寥。在捷克则形成了另一种情形。内耶德利认为“六十年代的民族解放运动是捷克民族史和捷克文化史上最为突出的一大事件。这场运动的领导者中有三大艺术家，直到现在他们还仍旧是捷克艺术最伟大的经典作者：他们是文学界的扬·聂鲁达，音乐界的贝德瑞赫·斯美塔那和绘画领域的约瑟夫·马涅斯”。其他国家没有这样的和谐，但是民族文化各领域的代表们也都在进行着复杂的共同创作。

在诸如波兰、匈牙利等国，文学领域的复杂进程很大程度上与铲除贵族的革命性，以及与在快速资产阶级化的社会中社会力量的重新分配相关。并非偶然的是，有时候对于正在成长起来的追名逐利的、庸俗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病态的独特洞察力正是浪漫主义作家的特征。他们往往倾向于将拯救的希望寄托于过去，而非未来。世纪下半叶，在该地区的众浪漫主义作家那里，我们听到了悲观主义的，有时候是悲剧的调子。可以引为例子的有诺尔维德、瓦依达、马达奇、爱明内斯库等。

该时期浪漫主义在各国文学中的发展水平和特征都是不尽相同的。但是各国文学无一例外都受到了这一文学流派极为重大的影响，而这一流派在这些文学中的功能则是大体相同的。浪漫主义的繁荣首先和民族解放斗争的白热化相关。众所周知的是，该时期浪漫主义在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发展呈现出了如之前匈牙利浪漫主义所具有的诸多特征。在匈牙利、罗马尼亚，以及捷克、波兰的文学中，浪漫主义在世纪的下半叶不但没有失去（在任何情况下，在这一时期的初期）其对文学进程的影响，且获得了全新的特质。

不顾一切地想将陈腐标准保持不变的追求导致了跟风模仿。但是，民族解放斗争时期十分典型的，渗透着深刻的乐观主义精神的浪漫主义的诸多特征却在保加利亚文学，以及部分地在南斯拉夫文学，特别是在塞尔维亚和现代希腊文学中得到了延续。

在其他国家的艺术家们那里，在对人类命运的哲学思考和深广的历史回顾面前，解放问题这一主要政治倾向如今退居次要位置。典范的全民族特征改变了，它们逐渐丧失了自己重大而深广的意义，成为这个或那个团体的财富，并且有时候还激烈地自相矛盾着。如今，浪漫主义诗人们较少地对现实生活中的具体历史事件，甚至是那些与民族解放斗争——它曾一度是浪漫主义诗歌的一大重要主题——相关的事件进行回应。

在对人类的历史命运进行思考的过程中，浪漫主义诗人有时候达到了很深的深度，展现了深刻的洞察力，并且揭示了十九世纪新出现的、极为现实的冲突（比如，爱明内斯库在其长诗《皇帝与无产者》中思考了由巴黎公

社带来的新的历史经验)。在这些诗歌中,出现了有关真正的文化价值和资产阶级社会不相容的观点(如马达奇的《人的悲剧》)。

诗歌延续并在很大程度上发展了十九世纪上半叶为浪漫主义文学所具有的创造概括性的象征形象的倾向。在这个时期的浪漫主义诗歌中,艺术和诗人的主题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出现了有关艺术的自我价值的思想,虽然这些思想并不像在法国诗歌中那么流传广泛。这一时期的诗人们在寻找新的诗歌形式方面做出了诸多努力(隐喻得到了丰富,词语的多义性和各种表达手段得到了更灵活的运用)。这一时期诸多诗人的创作对于二十世纪诗歌艺术探索显得如此重要也就并不是偶然的了(比如,诺尔维德、爱明内斯库、瓦依达、聂鲁达)。

在浪漫主义作家的创作中我们有时能够听到对于正在形成的资产阶级社会那心胸狭隘、唯利是图之本质的激烈批判。从民族期望的统一体和全民族在追求民族解放过程中结成的欢庆联盟中脱出身来使得作家们能够更加深入地观察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逐渐变得不能容忍的尖锐的社会矛盾。而这又导致了对于历史现实进行更深入的观察和对其进行分析思考。对于民族思想的态度的改变使得作家们更加认真地思索民族界限之外的情况,并使其将本民族之命运视作世界历史之一环来进行思考。由世纪上半叶的浪漫主义作家们开创的这一方面成为了世纪下半叶各国文学(波兰文学、捷克文学、匈牙利文学、罗马尼亚文学)中诗歌发展的重要特征。可以认为,新的历史条件改变了文学理解人性的角度。备受异族奴役并起身奋勇反抗的公民形象如今退居次要地位,代之而起的是生活在特定社会环境下,在一定程度上备受各种社会压力煎熬并为社会条件所决定的,同时又在生与死面前思索永恒的精神和道德价值以及自己在世上的命运问题的个人形象。

如今以新特征显现的民族解放问题本身,也引发了对于人民生活更为深入的观察,对于人民的过去、未来及其在世界中的地位进行更为冷静的思考。这些诗歌以浪漫主义作为开端并结合现实主义元素——从而形成了独特的诗歌类型,这一类型对于后代来说显得尤其具有前瞻性。可以归入这一类的诗人有:波特夫、伐佐夫、聂鲁达、捷赫、奥尔萨格赫维兹多斯拉夫、阿什克尔茨、阿兰尼等。

我们所考察的这一地区十九世纪下半叶文学的一大特征乃是诗歌占据着相比于在西欧各国文学和俄罗斯文学中更为重要的地位。在长诗和组诗中常常会阐发十分重要的现代观念并提出规模宏大的社会历史问题。在这种诗歌作品中,现实主义以一种特殊的、为诗歌独具的、同时也是少有人研究的方式渐渐形成。浪漫主义主人公退居次要地位,诗人们则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看待世界的现实主义眼光。在这里只要说出聂鲁达和哈列克、阿

斯内克和科诺普尼茨卡、赫维兹多斯拉夫、尚蒂奇、阿什克尔茨、伐佐夫和斯拉维伊科夫等人的名字便已足够。诗歌常常涉足以往“粗鲁散文”所在的领域，甚至于在某些情况下涉足新闻领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诗歌不仅是在和长篇及中篇小说，也是在和随笔及小品文竞争。在诗歌体裁中展现了城市下层人民生活的图景或者表现了农村中尖锐的社会冲突（在各国文学中这些主题正是在诗歌中首次得到了深入地挖掘）。在诗歌中，正像在散文中那样如此积极地挖掘被压迫者和贫苦者的内心世界。

对于人类情感的分析态度，更加具体的特别是社会的原因解释将许多诗人的诗引向现实主义诗歌总体上经历了某种“史诗化”过程。小型史诗体裁开始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其中包括一些，比如“图画”（科诺普尼茨卡正是如此称呼自己的生活素描的，它们有时也被称作“诗体短篇小说”）。赫维兹多斯拉夫将自己的诗歌称作小型史诗，类似的体裁也能在如阿什克尔茨、哈列克、伏尔赫利茨基、海杜克等诗人那里遇到。与小型史诗的新功能相关联的还有叙事诗体裁的广泛流行。 • 470

与小型史诗一样，大型史诗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浪漫主义长诗不同的是，如今这种体裁具有了历史具体性，特别是在处理当代生活素材时表现得尤为明显。

同时，作家们延续了浪漫主义的传统，及其高远理想的激情，民族解放斗争的火热和对大规模实现民族命运的不懈追求。如今，这种民族命运越来越被诗人们视作人类整体命运中的一环。聂鲁达、捷赫、伏尔赫利茨基、诺尔维德、爱明涅斯库、阿兰尼、马达奇、瓦依达等人诗歌中世界历史的主题和以往世界文化的形象正是从此发端的。因此，诗歌经历了独特的向现实主义转变的过程，它深入把握当代重大问题，用历史主义看待事件，采用宏大的、包容面广泛的艺术形式（长诗、组诗），并且用分析的方法深入到人的内心世界。

散文领域现实主义的确立在某些情况下（波兰）是和实证主义思想相关联的。然而，和外在于社会现实的西欧实证主义不同的是，波兰的实证主义中保留了有关艺术的社会功能的思想，尽管后者有着功利主义倾向的局限性。这一点在“带论题文学”的广泛流传中得以显现，而这样的文学是力求纯粹的科学公正的法国实证主义所完全不能接受的。需要指出的是，“波兰的实证主义首先不是哲学性质的，而是一个社会意识形态性质的流派，是一个推出整套‘基础工作’规划的流派”（戈尔斯基）。这是对于1863年起义失败的一种回应。

与此同时，在一些国家中为争取现实主义美学而进行的斗争受到了俄罗斯革命民主主义者们的强烈影响，并且纷纷涌现出与之相似的人物（波

特夫、卡拉维罗夫、捷克的“五月派”，塞尔维亚的马尔科维奇等）。

在该地区的所有国家中，现实主义经历了由表面描画到大规模艺术概括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浪漫主义传统和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的精神开端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与此同时，对于解决民族爱国主义和教化任务的不懈追求还与该时期现实主义中各种理想化的倾向（波兰“带论题”的长篇及中篇小说，匈牙利的“民族爱国”学派，捷克的马萨里克“现实主义”）相联系。通向成熟的批判现实主义的道路并非直接而平坦，而该地区大多数国批判现实主义的高潮则在我们考察的这一阶段之后才到来。

伴随着现实主义的发展，体裁系统也发生了最根本的变化。在此之前几乎处处占主导地位的诗歌如今却在很大程度上让位给了散文。从这样或那样的“生理特写”的形式中，在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中小型体裁获得了新的可能性。这些体裁的主题也有所扩展：社会下层阶级的代表、被压迫者和贫苦者的形象受到了它们的关注。作家们逐渐摆脱了在前一个阶段描写人民时常具有的理想化因素和感伤倾向，并且更加深入地考察在资本主义制度迅速形成过程中出现的复杂而尖锐的冲突。社会各阶层的，城市和乡村的，每个国家各个拥有独特历史和文化的地区的生活面貌都在文学中得到了体现。

在社会生活散文领域（卡拉维罗夫，菲力蒙等），作家们确立了直接刻画生活环境和被最为清晰地表达的社会冲突及社会类型的目标。然而，在各领域中，比方说，在法国自然主义中不同的是，并没有指望艺术的公正性。公开的片面性才是这种文学的特征，其中有强烈的批评，有时候是讽刺的氛围。总的看来，讽刺的意义在散文和诗歌中的凸显对于这些国家文学的这一发展时期来说极为重要。在一些国家的文学中，相比取材于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来说，小型题材在艺术上显得更加成熟，且在现实主义深度上更进一步。对小散文形式进行系统地汇编的倾向也十分重要。它使得在短篇小说的框架内描画深广的社会现实和在对人类及社会生活一系列重大问题方面进行整体思考成为可能。系统汇编形式的采用催生了如聂鲁达的《小城故事》，康斯坦丁诺夫的《甘纽大叔》等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

471 · 如今，长篇小说开始跃居重要地位。该地区所有国家文学共同经历了这一过程，但是它的速度和特征却是因国而异的，因为各个国家的原初状况是不尽相同的：波兰文学中，长篇小说在十八世纪就已存在了；然而，比方说，在保加利亚文学中，此时才出现第一批长篇小说体裁的作品。

和民族解放斗争问题相关联的有这一时期在该地区大多数国家文学中历史小说所发挥的特殊作用；正是这一体裁所获得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这些国家文学对世界文学进程所作的最为重大的贡献（显克微支、伊拉塞

克、舍诺阿、伐佐夫)。这种小说的结构(这里可以指结构类型的总特征)和沃尔特·司各特、雨果的作品,福楼拜的《萨朗波》以及迈耶的小说不同。该地区的作家们是在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的驱使下写作历史小说的,它们的这一特征也决定了其以教育功能为主,并且较少与读者产生情感交流。难怪显克微支要说,他的小说是为“拥护民族精神”而创作的,而伊拉塞克的声明也与之相呼应:“我们特别需要回忆自己民族的历史,它给予我们力量,激发我们采取行动”。十分重要的是,这一类型的小说正是和民族历史息息相关的。绝非偶然的是,普鲁斯根据古埃及历史资料写作的《法老王》完全是另外一种类型的小说,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引领了二十世纪历史哲理小说的诸多特征。对于所刻画的历史时期及其在民族历史中的作用所采取的确定的、自成一体的观点导致了创作宏伟英雄系列倾向的出现(显克微支、伊拉塞克)。这些系列并不是由情节,而是由统一的激情和一致的历史观念结合在一起的。与民族解放斗争的主题相并列的是人民反封建起义的主题(伊拉塞克、舍诺阿)。群众运动的场景和各主人公自我牺牲的英雄事业都被作家们以史诗般的恢宏气势加以描绘。人们常常将显克微支或者是谢诺阿的作品与沃尔特·司各特的作品加以比较。它们之间的相近性实在是显而易见的:惊险的故事情节,十分生动的历史描绘,情节及主人公思想中的诸多浪漫主义元素等。不过,与司各特的“中间人”不同的是,它们作品中的主人公往往是历史事件的积极参与者,并对其进程产生影响。爱情故事在这些作品中并不决定情节的发展,甚至有些时候完全退居次要地位。

尽管在历史小说中有不少浪漫主义的特征,但是它还是在各地区文学现实主义体裁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历史小说解决了那些对于现实主义小说整体而言极为重要的艺术问题。首当其冲的是揭示个人生活与历史之间的关系问题。

描写当代生活的小说体裁尽管在十九世纪最后十年中有过改良,但是它的形成过程却十分艰难和滞缓。在历史的跨度中,社会生活呈献给作家们的是一些普遍特征,在作家接近当代生活的时候,社会生活显得不重要了,失去了自身内在的关联性并分裂成一些风俗画。然而,在小说中,作家们却在竭力寻求以看待世界的综合眼光,来解释个体命运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展现人的个性并力求解决一些事关全人类的问题。

在该历史时期中,描写当代生活的社会小说在那些不曾拥有这一体裁的各国文学中渐渐勃兴(捷克的阿尔别斯、斯维特拉;匈牙利的米克沙特、托尔奈;克罗地亚的科瓦契奇等)。

如果说对于情节和对现实材料广泛的囊括力之间有机关系的探求往往会导致作品流于编年史的形式的话,那么要保持描绘现实和思考现实之间

472 · 的艺术平衡同样绝非易事。在现实主义形成的早期阶段,对于社会现实的热切参与倾向常常表现在那些所谓的“论题小说”的形式中。波兰文学中不仅形成了这类小说的美学标准,而且还出现了该类小说最为犀利的变种(如奥热什科娃的小说)。“论题小说”的理论和实践最早会在波兰文学中遭遇崩溃并非偶然。早在奥热什科创作的成熟期以及普鲁斯的创作中对于该类小说而言十分典型的、存在于艺术功能和社会功能之间的矛盾问题便已得到了解决。诸如奥热什科的《尼曼河上》和普鲁斯的《玩偶》等作品乃是批判现实主义的重要成果,是这一地区文学中描绘当代生活,并对国家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进行深入分析的社会心理小说的新类型。按照其特征来说,这些小说最接近同时期的俄罗斯小说。我们在此不仅可以列举托尔斯泰,首先是其《安娜·卡列尼娜》,还有冈察洛夫的各部小说。这一类型学上的相似体现在对于当时社会生活动态的广泛囊括,体现在对于当时最尖锐问题的提出,体现在美学问题的重要性和对于主人公精神探索的关注上。与这些本质特征相关联的还有寻求对于主人公的心理作更为精细的揭示。这样一种寻求不仅体现在广阔的社会领域中,也体现在像显克微支《毫无规则》之类的特殊心理小说中。使得波兰文学和俄罗斯文学相接近的一点还在于两者都凸显人的社会责任问题的重要性。

除了与俄罗斯文学的相近之外,该时期的小说在某种程度上的另一大特征是深受自然主义,尤其是左拉作品的影响。然而,自然主义的影响丝毫未能减弱各国文学社会批判的锋芒,对于现实不作评价的思想是和这些国家的文学格格不入的。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尖锐的社会讽刺文学(哈弗里切克鲍罗夫斯基,卡拉迦列,康斯坦丁诺夫等人的创作)占据了特殊的位置。此处值得一提的还有现实主义讽刺文学的出现与发展,它在文艺观念方面和流行于早先阶段的启蒙主义讽刺文学以及在此时的文学中还占据一席之地的浪漫主义讽刺文学不同。十九世纪下半叶这一地区最主要的新特征——现实主义形成并快速发展,且最终在各国文学中均占据了主导地位。

第一章 波兰文学

1. 1848—1863 年间的波兰文学

在波兰历史上从 1830 年革命到 1863 年革命为止的这段时期还完全属于贵族解放运动时期。无论是 1846 年的克拉科夫起义,还是 1848 年的波兹南起义和西加利奇的爱国运动都未能给波兰人民带来民族解放。

在俄国(波兰王国)、奥地利(加利奇部分)、普鲁士(波兹南公国)瓜分下变得四分五裂的波兰在贵族的带领下为解放领土进行斗争,并破坏了那些欺压自己的帝国的君主制根基。这也使得波兰成为了欧洲解放运动的先锋。列宁曾经说过,十九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波兰贵族的解放运动不但从全俄的、从全斯拉夫的民族运动的观点,就是从全欧的民主事业来看,都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

1846—1849年的震撼体现在了所有波兰文学家的变化中。他们中的一些与民主决裂并加入了反动阵营,另一些在厄运中挣扎并在浪漫主义中寻求避难所,而大部分人在反动派的压迫下陷入了低谷。

虽然移民人数又有了新的增加,然而1848年后移民已经无法发挥昔日的杰出作用。1852年在奥地利统治下的利沃夫出版了新的杂志《作家日志》,在这份杂志的周围聚集了民主派别最著名的浪漫主义作家。1860年在杂志上发表了乌叶伊斯基的《利沃夫的来信》,这是当时抵抗反动文学的最出色的报告文学作品。

这一时期波兰文学发展的另一根据地便是俄罗斯帝国的立陶宛、白俄罗斯、乌克兰地区。农奴问题的尖锐性使知识分子(包括波兰的知识分子)开始关注社会问题,并使一批作家(例如,克拉谢夫斯基、科热尼约夫斯基、塞罗科姆拉)创作中的现实主义色彩愈加浓烈。

1848年波兰浪漫主义在侨民作家的创作中达到了辉煌的顶点后便开始逐渐衰弱,虽然直到1863年它仍然占据统治地位,这首先表现在承认诗歌是最重要的文学体裁这点上。诚然,散文已经取得了成绩,然而无论是在作者还是在读者的意识中,正是由于诗歌与浪漫主义的反抗气概有着传统的关联,因此比起中篇、长篇小说,诗歌获得的评价更高。

在1846—1863年间波兰积极浪漫主义流派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是加利奇诗人:乌叶伊斯基和罗曼诺夫斯基。

• 473

科尔涅利·乌叶伊斯基(1823—1897),从模仿密茨凯维奇的十四行诗和维克多·雨果的诗歌创作经验起家,后来成为了斯洛伐茨基最出色的追随者之一。以“圣经”风(波兰浪漫主义的体裁之一)的形式表现革命情绪使得乌叶伊斯基的诗歌与众不同。他最重要的作品是《耶利米的抱怨》(1847)。诗人以《圣经》先知的形象悼念了在“加利奇大屠杀”中牺牲的人,正是这一流血事件镇压了克拉科夫起义。诗人在世的时候他的诗集《无香花》(1848)闻名于世。他还写下了诗集《为了莫斯卡尔人^①》,其中的诗歌发

① 莫斯卡尔人,乌克兰语、白俄罗斯语、波兰语中俄罗斯人的别称。——译注

扬了贵族革命家的优良传统,成为了1863年起义前夜起义者号召波俄两族人民联合起来共同抵抗沙皇专制的口号。

“雷雨前的诗人”、斯洛伐茨基的追随者中最具特色的要数梅契斯拉夫·罗曼诺夫斯基(1833—1863)。诗人于1863年的一场起义战役中壮烈牺牲。他的长诗《松契来的姑娘》赞颂了1655年波兰手工业者和商人抵御瑞典侵略的英雄事迹。然而无论是对于诗人自身,还是对于那一时期的波兰浪漫主义来说,他写的爱好自由的颂诗、颂歌、圣歌、祷文、歌曲以及公民爱国诗歌形式的作品则更为典型。在这些作品中祷告英勇的自我牺牲与预感灭亡形影相随。即便在浪漫主义诗歌中取得了成就,波兰浪漫主义在这一时期却已日薄西山。它在形式上也趋于枯竭,模仿的趋势占据了上风。在书刊检查制度的压迫下,波兰诗歌从未如此广泛地推广寓意语言。在这种寓意语言中牢牢地固定了许多象征符号,它们经常演化为刻板的模式。

在这种文学环境下,对民间口头创作,尤其是民歌的加工则成为了诗歌创作的重要趋势,因为民歌是最具有宣传和动员效果的体裁。当时在这一领域活跃着两位著名的诗人——莱纳尔托维奇和塞罗科姆拉。

特奥菲利·莱纳尔托维奇(1822—1893)在波兰文学中被称为“马佐夫舍的里拉^①歌手”。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莱纳尔托维奇在马佐夫舍收集民间文学,而这些收集成果也决定了诗人创作的最重要特征。民间的视角和民歌的诗体使得诗人避免了多愁善感,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抒情的亲切感。这种情感在他最著名的诗集《里拉》(1855)和《新里拉》(1859)中体现得淋漓尽致。1863年起义的题材则出现在诗人最激进的一篇作品——《马尔钦·博列里约夫斯基列列维里》(1865)中。莱纳尔托维奇翻译过普希金和缪塞的作品,还翻译过但丁的《神曲》。这位波兰诗人侨居法国和意大利并最终客死他乡,他的作品在这些地方被翻译的数量最多。

弗拉季斯拉夫·塞罗科姆拉(真实姓名路德维希·康德拉托维奇,1823—1862年)自称“农村的里拉歌手”。诗人出生在并不富裕的小贵族家庭,大半生的时间都生活在农村。诗人初登诗坛便以加温达诗《邮递员》(1844)一鸣惊人,诗歌的俄语译本《当我还是一名邮局的驿站车夫……》也备受人们的喜爱。

加温达诗是一种模仿口头叙述、通常以诗体形式出现的文学体裁,也是波兰浪漫主义作家最喜爱的体裁。当反动作家经常在加温达诗中颂扬小贵族的旧传统时,塞罗科姆拉则在诗中揭露社会的不公。诗人描写农奴悲惨

① 东欧的一种弦乐器。——译注

命运的叙事诗以及所有六篇组诗《加温达诗和诗篇》(1853—1860)都充满了社会批判,这明显遵循了训诫教育讽刺作品的传统。

与加温达诗的创作同时,塞罗科姆拉和莱纳尔托维奇还热衷于“插画体”诗歌的创作,后者则成为了科诺普尼茨卡现实主义诗歌的主要形式之一。除了这种诗歌与散文在体裁上的契合之外,在塞罗科姆拉的创作中现实主义趋势还体现在诸多方面,例如,对民间诗学的探索,在诗歌中补充口语语调,以及用词、形式的朴实等等。但是总体上他的作品还是属于浪漫主义,他的诗作《疯人院的旋律》(1862)充满了辛酸的哀痛,成为了浪漫主义在诗人创作中的最佳体现。塞罗科姆拉的众多诗歌翻译促进了波兰与西欧、俄罗斯的文学交流。

奇普里安·卡米利·诺尔维德(1821—1883)在波兰第二代浪漫主义作家中占据了独特的地位。在诺尔维德同时代的波兰诗坛中,他的创作可谓是独树一帜。他出生在小贵族家庭,并在华沙的一家贵族中学接受了教育。1842年诗人迁居国外,自此过上了在世界各地漂泊的日子。他拿过雕刻家的刻刀、画家的画笔、伐木工人的斧凿,以此来维持生计。他在巴黎生活了三十多年。在巴黎这位耳聋、孤苦无依、被世人遗忘的老人度过了自己最后的时光。在这之前诗人还去过比利时、德国、意大利、英国,1852年他还去美国碰过运气。1847—1848年他在罗马与克拉辛斯基为友,然而在这几年教权主义圈子里的人对他的影响更大。在巴黎诺尔维德还结识了傅立叶、圣西门、蒲鲁东等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家,这一思想在诺尔维德身上与基督教人文主义结合在了一起。在巴黎诗人还与密茨凯维奇、斯洛伐茨基、肖邦有过交往,为了纪念这份友情诗人在1856年写了回忆诗集《黑花》。在那里诺尔维德还结识了巴枯宁、赫尔岑、屠格涅夫、黑尔韦格等作家。与世界民主侨民人士的交往削弱了诗人与教权主义贵族们的联系,但却没有使诗人根本地改变自己的看法。诺尔维德努力使自身独立于侨民组织之外,这是同胞与他疏远的原因之一。

为了响应欧洲人民的起义,诺尔维德创作了长诗《还有话》、《前夜》(1848)。虽然诺尔维德也指责专制独裁与农奴制,但与密茨凯维奇不同,他却否定了革命暴力的必要性,并把个性的道德自我完善视为进步的保证。诗人认为在人类自我完善中艺术以及艺术与劳动的结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普罗密特迪安》,1851年)。他发表的作品引起了评论界的攻击,被人指责为“风格模糊”和“错综复杂”。诺尔维德只出版了不多的作品,许多出色的作品生前都未能付印:抒情诗集《小手册》(1865—1866年,部分内容于1901年才问世);哲理史诗《阿松塔》(1870年,出版于1907年);短篇随笔《辛格里沃尔特勋爵的秘密》(1877年,出版于1902年);《印章》

(1883年,出版于1904年)以及一系列未完成的长诗和剧本。

诺尔维德遗作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抒情诗,特别是那些歌颂杰出人物和卓越事迹的诗歌。这些人和事象征了崇高的文化和对人类的挚爱:《拜姆记忆中的哀曲》(1851年,出版于1910年);为纪念密茨凯维奇而写的诗《你为雅典做了什么……》(1856年,出版于1908年)、《斯巴达》(1857年,出版于1907年);为悼念美洲黑人的保护者逝世而写的《约翰·布朗》(1863),以及《肖邦的钢琴》等等。

捍卫真正的人类品质的豪迈气概与对无情践踏这些品质的当今社会的讽刺是诺尔维德笔下的两个极端。诺尔维德反对资产阶级的的情绪并没有触动他的同胞,与其说这些人受苦于资本主义的祸害,不如说他们是在遭资本主义发展落后的罪。

与其他同时代的波兰浪漫主义作家一样,诺尔维德自诩为密茨凯维奇、斯洛伐茨基、克拉辛斯基的追随者,但却不是模仿者。他的作品的确是原创的,甚至在对于爱国主义的理解上。在诗歌《我的祖国》(1861)中,波兰对于诗人来说只是整个宇宙家园的一部分。诺尔维德是一位深受欧洲文化历史鼓舞的诗人,也是一位在往昔的岁月中洞察现实生活的浪漫主义作家,更是一位把全人类的道德基石看得与对波兰的忠诚同样重要的道德说教者。因此,波兰政府长时间地与他断绝了关系。

诺尔维德好奇地观察着文明世界的弊病,然而折磨着诗人的各种思考却因为语言的复杂性而不为人们理解。诺尔维德语言多义,像一条抛物线一般,确实非常难懂。诺尔维德的诗句略显粗糙,带着独特的递减的语调,这与其说让人印象深刻,不如说使人感到惊讶。另外,他个人对韵和传统作诗法的其他条条框框的摒弃也使读者感到讶异。然而,对奇谈怪论的青睐,智力游戏,对思想的形象化展开进行出人意料的省略或是增加,言简意赅却又冗长累赘,少量的暗示与演说交替出现,所有这些技巧在后来对于波兰文学界都是受益匪浅的。

诺尔维德非常了解法国高蹈派诗人,使诗歌意象饱含雕塑艺术的印象也使得诺尔维德与他们格外亲近。诺尔维德还研究过诗歌手段的结合性,早在兰波之前他就在《琴斯托霍瓦诗集》(1851)中将字母与物体外形、概念与颜色联系在了一起。他比法国诗人更早地开始广泛实践无韵诗,并在马拉美之前就提出了“沉默理论”。在寻找新的体裁形式时他还形成了自己的戏剧理论,在这些新的体裁形式中他把将现实性与诗歌融为一体的“高喜剧”看成是与自己最为亲近的体裁(例如他的短剧《贵妇人的钻戒》,1872年,出版于1933年)。

诺尔维德是一位杰出的创新者,他引领了波兰诗歌的发展。作为波兰

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在自己的祖国诺尔维德的作品在二十世纪初才得见天日。自此诺尔维德才开始影响波兰诗歌,他在国外的声誉才被承认。(里尔克、纪德等评论)

十九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波兰的社会环境和人们的内心需求要求首先阐述日常生活,洞察现实环境。这促使一大批作家转向现实主义立场,把散文视为首选体裁,促进了大型叙事文体的发展。

• 475

波兰文学现实主义流派的奠基人是克拉谢夫斯基和科热尼约夫斯基。

约瑟夫·伊戈纳茨·克拉谢夫斯基(1812—1887)一生著书五百余卷。作为一位散文作家、诗人和剧作家,他不仅是世界文坛著述最丰富的作家之一,还是一名出色的文学评论家、政论家、学者、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在他的遗著中最珍贵的当属中篇和长篇小说(一百四十四部社会生活小说和八十八部历史小说)。

克拉谢夫斯基饱览巴尔扎克、狄更斯、果戈理的作品,这极大地巩固了作家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倾向。为了使日常生活的画面在“后世”永垂不朽,克拉谢夫斯基描绘了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变化,他在自己创造的社会关系中寻找着一把打开人类奥秘的钥匙。在波兰散文领域现实主义流派始于克拉谢夫斯基的中篇和长篇小说,作者在其中缅怀了农奴的苦难生活(《萨夫卡的故事》,1842年;《乌兰娜》,1843年)。

在批判农奴制的同时克拉谢夫斯基也担心资产阶级习气的侵蚀。然而他批判的矛头主要还是指向了封建贵族阶级。他的许多作品都揭露了封建贵族阶级的道德败坏、寄生退化。较之其他作品,长篇小说《神奇的灯笼》(1843—1844)、《两个世界》(1855)、《世纪的病痛》(1856)更大地促进了现实主义的确立。一般来说,克拉谢夫斯基的散文形式多样,融合了不同的创作倾向(他的创作中有浪漫主义的、现实主义的、甚至还有自然主义的作品)。

克拉谢夫斯基以一系列的半报道式的中篇小说回应了1861—1864年波兰王国的动乱。这些作品是作者侨居德累斯顿时所作,从华沙被驱逐了以后作者就在1863年迁居到了这里。其中最著名的是中篇小说《老城的孩子》(1863)。

在遭遇了十九世纪里第三次起义失败以后,克拉谢夫斯基开始将革命运动与自由主义救国方案对立起来,后者与实证主义论点有着紧密的联系。克拉谢夫斯基没有停止抨击专制制度、封建贵族和教会反动势力,他在一些所谓的政治小说集(《杂种》,1867—1868年;《在浑水中》,1869年等作品)中坚决地号召同压迫者进行道德斗争。

克拉谢夫斯基最出色的历史艺术作品要数以十八世纪撒克逊王朝为题